小字典里的大文化

本报记者　**柴逸扉**

《新华字典》纪念版

4月中旬，吉尼斯世界纪录高级副总裁马克·弗里加迪正式确认，《新华字典》是世界“最受欢迎的字典”和“最畅销的书”。截至两项纪录统计的计算时间（2015年7月28日），《新华字典》全球发行量共达5.67亿本。

“这不只是一本字典，更是我们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记忆！”在商务印书馆发起的读者“晒字典”活动中，读者晒出了十几种版本的《新华字典》，同时表达了自己在《新华字典》陪伴下识字、阅读，一路走来的感慨。

尽管它只有手掌大小，却蕴集了一种文化理想。小字典背后，折射的是大文化。

大学者编小书

《新华字典》是应历史潮流而生的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百废待兴，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、特别是中小学教育面临着普及和提高。1950年，著名语言学家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魏建功牵头组建新华辞书社，兼任社长并开始主持编纂《新华字典》。

周恩来总理两次接见《新华字典》修订小组代表，听取汇报达3个小时，亲订字典的修订原则，改正字典词条，甚至过问字典的定价及“降成本”问题。“文革”中，尽管极左思潮对《新华字典》的修订产生很大阻力，但在周总理关心下，1971年版《新华字典》从修订到出版只用了1年时间。

从编纂之日起，这本小字典就蕴集了为民族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的文化理想。它的旗下，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——叶圣陶、魏建功、邵荃麟、陈原、王力、吕叔湘、金克木、周祖谟等。小字典大学者，这个特色保持了60多年。

这些文化大家带来的不仅是独到的专业见解，同时还有热心奉献的精神。叶圣陶在选题和主编人选的确定、编写体例的修订等方面都亲身参与，魏建功主持字典编写，不领出版社的工资。

这种精神被代代传承。2003年，《新华字典》第10版修订期间正遇上非典，为了不耽误进度，大家在不能聚集开会的情况下打电话讨论，两两之间约定时间、地点，在街头见面互换稿件，犹如当年的“地下工作者”。

扫盲识字工具

1953年，《新华字典》正式出版，成为几亿人民扫盲识字、学习文化的良师益友。

“我到农村插队后，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，先从修身开始。一物不知，深以为耻，便求知若渴。上山放羊，我揣着书，把羊圈在山坡上，就开始看书。锄地到田头，开始休息一会儿时，我就拿出《新华字典》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，一点一滴积累。”2013年“五四”青年节，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，提到了自己与《新华字典》的故事。

英雄欧阳海生前只上过一年半夜校，却依靠查《新华字典》通读了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、二、三卷；残疾人作家刘水8年里翻烂3本《新华字典》，自学了从小学到高中全部课程，走上文学创作之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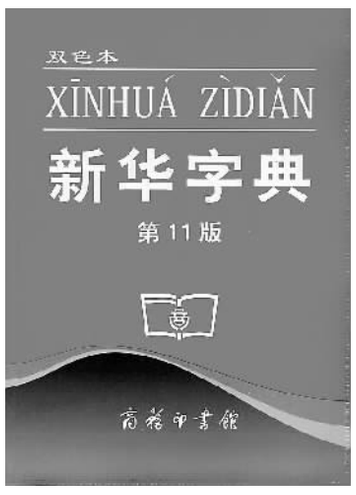
在偏远地区，《新华字典》“一书难求”，学生想拥有一本自己的“字典”，只能依靠抄写。即便到了2010年，广西仍有部分困难地区小学缺少正版《新华字典》，致使质量粗劣、漏洞百出的仿冒字典充斥校园。事件曝光后，商务印书馆于第一时间赶到这些学校进行公益捐赠。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在代表委员们的建议下，《新华字典》纳入中央“两免一补”政策名单，贫困地区的学生能够获得免费的《新华字典》。

《新华字典》可谓凝聚了全社会的共同智慧。《新华字典》的读者，同时是字典的良师益友。“鹅”，在《新华字典》中原注释为：“一种家禽，比鸭子大，颈长，脚有蹼，雄的头部有黄色突起。”后来，有读者给编辑部写信，说他按照《新华字典》的区分，把“头部有黄色突起”的鹅杀了，却发现腹中有卵。编辑们查了相关资料才得知，鹅不分雌雄，头部都有突起，只是雄鹅突起大一些，于是在1979版中做了修改。

藏书票

《新华字典》发行五亿册纪念

紧跟时代步伐



如今，《新华字典》已经更新到第11个版本，第12次修订正在进行中。《新华字典》的修订紧跟时代步伐，对文字的释疑、用法做更新。

1998年，《新华字典》修订本新增加了一个“焗”字，同时添加了“焗油”这个词。怎么解释“焗油”，大家都没多少把握。编辑贾彩珠先后两次到理发店请教并体验了焗油，最后注释确定为：“一种染发、养发、护发方法。在头发上抹油后，用特制机具蒸汽加热，待冷却后用清水冲洗干净。”

“比如‘拜’，第10版只有一个读音bài，第11版增加了新的读音bái，如‘拜拜’，表示再见或结束某种关系。还有像‘的’，第10版有三个音：de、dí、dì，而第11版增加了dī的音，如‘的士’，表示出租车。这两个字新增的发音分别来自英语和粤语，普通话中本没有这样的发音。但因为社会使用度较高，因而就收录进字典了。”采访中，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说道。此外，第11版《新华字典》将“晒”字的解释中加入了“晒工资”“晒照片”这样的注解，还有“车奴”“房奴”“灾民”“股民”“农民工”等体现时代特点的词。“不过，我们通常是增加最精华、最普遍、最常用的词语，不是所有网络流行语都会采用。比如表示尴尬表情的‘囧’字，表示起较大作用的‘给力’，这些词流行了一段时间后并不是很常用，所以就不会收录新词或修改原词的注解。”

目前，他们正在设计和研发《新华字典》手机版本，将来读者可以通过下载APP的方式，更方便地使用《新华字典》，与纸质《新华字典》形成互补。

国际交流使者

在对外交流中，《新华字典》代表国家形象，传播中华文化。

相传上世纪70年代，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接受西方某国政要赠送的百科全书以后，把《新华字典》作为国礼回赠给对方。“大国家，小字典”的说法因此广为流传。2006年，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时，向耶鲁大学赠送了567种1346册中国图书，其中就有《新华字典》，并在介绍时称它为“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”。

一个叫盖娅的外国学生在北京大学留学，她每天都要用《新华字典》纠正发音、写论文、做翻译。有一次她在电视上看“龟兹文化”，发现“龟”不念“guī”，而念“qiū”，她立刻查《新华字典》，才知道“龟”在古代有地名的用法。因其篇幅小，便携带，内容丰富又语言平易，《新华字典》已成为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及中华文化的好帮手。许多外国人在说话、唱京剧或者说相声时，习惯说“我查过《新华字典》了”，显示了字典的权威性。欧美、东亚、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，都引进了原版《新华字典》。在日本，学者香坂顺一、宫田一郎等合作翻译了《新华字典》的日文版，与原版的中文版一道发行。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谭跃表示，《新华字典》获评世界上“最受欢迎的字典”和“最畅销的书”，本身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，从微观层面反映了汉语国际影响力的提升。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则表示，这一荣誉印证了《新华字典》品牌的国际影响力，将为他们和更多国际一流文化机构合作带来新的契机。

书话亦见学养

路来森

《书鱼繁昌录》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）涉及的话题极其宽泛：关于书籍的相关知识毛边书、线装书，藏书票、藏书印，护封、腰封等；个人搜书、淘书的经历；书籍的收藏、拍卖；民国漫画、私人日记；书评、序跋以及对特定历史现象和事件的探讨分析等，可谓忠实记录了谢其章先生近几年的藏书经验和阅读心得。

经验，仅供借鉴；心得，却是至关重要的，它不仅能看得出一个人学识修养，更能见得一个人“识见”的高低。

喜欢藏书的人，大多津津乐道“猎书”的过程，而谢其章先生，却独写“整理旧书”的那份感受，字里行间，流淌着一种暖暖的书之爱意：“夜里，静坐在孤灯下，一本本地整理白天从旧书摊捡回来的几摞书，擦掉书上的灰尘，补齐封面的缺角，抹平书页的折痕，那情景，与孤儿院院长为捡来的孤儿洗澡、穿衣、理发，庶几近之。”

姜德明先生，三十年如一日坚持写“书话”，有人评价他写作“保守”，言外之意：“书话”谈不上是什么大文章。对此，谢其章先生在文章中写道：“书话，是一门特立独行的文章形式，不可能像散文那样人人都能写。书话写作的首要条件是作者必须自存自藏一大堆旧书刊做资料后盾（不非得是汗牛充栋的藏书家，至少也是藏书爱好者）。”旗帜鲜明地肯定姜德明先生的写作“不是保守，是坚守”。

通过对老民国“旧报旧刊”的研究，对一些历史事件、现象的存疑进行揭秘、解答，是谢其章文章中最为可读的一部分。

1942年，梅兰芳是如何从香港回到上海的？张爱玲在《小团圆》中，回忆她从香港回上海，是和梅兰芳同船的：“她立刻想起回上海的时候上船，珍珠港后的日本船，很小，在船栏杆边狭窄的过道里遇见一行人，众星捧月般的围着个中年男子迎面走来，这人高个子，白净的脸面，细细的两撇小胡子，西装虽然合身，像借来的，倒像化妆逃命似的，一副避人的神气，仿佛深恐被人占了便宜去，尽管前呼后拥有人护送，内中还有日本官员与船长之类穿制服的。她不由得注意他，后来才听说梅兰芳在船上。”似乎言之凿凿。但谢其章却利用1942年8月8日《太平洋周刊》第1卷第30期的“本报专访”，证明梅兰芳是于1942年7月26日在“大场飞机场”下机的。

“南玲北梅”事件，一度喧嚣。此前，止庵、赫啸野等人都曾撰文证明其荒谬性。谢其章在《自编自演之“南玲北梅”》一文中，再度利用大量详实的资料，并附上梅娘“第三届大东亚文学奖”的受奖照片，证明了“北梅”言论的极大荒谬性。就此见得，所谓“北梅”的梅娘，不仅“早节”不保，“晚节”更是荡然无存了。

书中谢其章对“书画无偿捐献”的质疑，对收藏界“富则俗”的看法，对电视收藏栏目“人来疯”现象的分析等等，都彰显着作者独立的思考和独到的分析。而这一切，无不以其丰富的图书收藏和阅读为基础。归其大类，这些文章到底还是“书话”类文章。

《新疆世界文化遗产图典》有了日文版

4月27日，日本侨报出版社出版发行《新疆世界文化遗产图典》日文版，该书由日中友好人士小岛康誉主编。

2015年9月，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发行了全彩写真集《新疆世界文化遗产图典》，用饱含冲击力的全彩照片与文字解说，展示遗迹今貌，收录中国四大石窟寺院之一克孜尔石窟中现存、“世界为数不多”的栩栩如生的唯美壁画，曾存在于公元前1世纪-14世纪的高昌国王城、高昌故城遗址建筑结构等圣观，展现了这片神秘土地的浪漫气息。

该书一经面世，期待日文版发行的呼声甚高，日本侨报出版社决定推出该书日文版。

何不让人多读书？

余毛毛

每次到图书馆去借书，管理员刷借书卡时都要问一声：“你是余毛毛么？”我说是。我没听过他们问别人，心里很纳闷他们为什么要问我。

有一天中午，同事叫我把他借的书一起还了，并说他这阵子没时间看书，不再借了。我听了灵机一动，说把你的借书卡给我，我多借两本。

到图书馆，选好了书办手续时，被告知我不能代别人借书，我这时才恍然明白我每次借书时都被问一下名字的原因了，那大概是因为我的名字会给人一种错觉，以为我用了一个女孩子的证来借书。但见我每次都答得随随便便又信心满满，才没有深究而已。

这让我很感慨，说真的，到图书馆借书现在虽然是免费的，但借阅者还是要花一定的成本。我家在城市西边，我的单位在城市北边，而图书馆在城市的东边，无论我是从家还是从单位到图书馆，都要倒两次车，遇上刮风下雨，有时也还打个车。更重要的是时间成本，我每次借书都是匆匆忙忙，很少在书架前从容地寻寻觅觅，所以有时候借回来的书很不对头。

我们这个城市的图书馆规定读者一次只能借两本，借期15天，超过时间就罚款。如果说读像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那样的大部头书，15天两本是够了；但读一些小薄书，比如一些散文随笔集，15天两本就嫌少，往往是不到一星期，我就得来还书，这样也就加大了金钱和时间的成本。

如果说怕读者用别人的借书卡借书，会带来些管理上的漏洞和麻烦还可以理解的话，那么怕一个读者过多占用图书资源，我觉得这完全没有必要，每个读者完全可以再允许多借一到两本书。图书资源不够再追加，打造书香社会是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的，一年追加一点可以大致计算出来的书钱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近600万人口的地级市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。

图书馆是一个城市的精神蓄水池，我认为它的功能首先是吸引更广泛的人来汲取精神的养分，它应该担忧的是读者少看书，而不是防止读者多看书。第二就是给读书欲望较为强烈的人以一定的扩张空间，书本数量适当放一点，没空读的自然是少借或不借，因为毕竟书到期不还还有个罚款措施来调节。何不让人多读书？

书是福地　别有洞天

熊仕喜

有书读真是一件幸福的事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农村里要想找到几本好一点的书可真不容易。但只要我提出要书读，父母总会想法设法地去给我借。尽管父母都不识字，可是他们却偏偏信奉读书的好，对我读书的喜好格外支持。

记得读五年级的时候，看了本《三打白骨精》的连环画，从封底的介绍中知道了《西游记》中还有很多神奇而有趣的故事，总觉得看连环画不过瘾，就把想读《西游记》的想法告诉了妈妈。当天晚上，妈妈就带着我出门借书去了。问了很多人家，都说没有，有的人还说，肚子都吃不饱，哪儿还有钱买书呢！听说邻村有几户人家的孩子在读高中，妈妈把我送回家后，又跑到临村去借。过了很久似的，妈妈终于回来了。她给我带回了一本《红岩》，说是人家也没有《西游记》，只借到了这样一本大书。虽然有点失望，但我还是连读带猜地读完了这本书。有一次，语文老师给我们讲些对联史话，问我们谁能说几副对联时，我随口说出了《红岩》中的几副：“洞中才数月，世上已千年”“满园春色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”，后面这副古诗对联我记得最为清晰，当时老师狠狠地表扬了我，还说我是其他同学的好榜样呢。

读书让我感受到快乐，我也开始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藏书，这个愿望在我读初一的时候实现了。有一天，妈妈从城里卖农产品回家，递给我一本书。天啊，就是我渴慕已久的《西游记》！我问妈妈，过了快一年时间了，你怎么还记得书的名字？妈妈说，她在书店里问人家有没有“孙猴子”“唐僧”的书，人家说是这本《西游记》。

随后的日子里，我一有空就读《西游记》。以前晚上常常是父母给我讲一些民间流传的故事，现在我能把“孙猴子”的故事讲给他们听。每次听完我讲的故事，大人总不忘告诉我：“好人有好报，不能做孬人！”父母所指的“好人”便是像孙大圣一般善辨忠奸、除恶务尽，像唐僧那样一心向善、矢志不渝的人。“孬人”就是那些奸诈贪婪、心狠手辣的人。“善恶有报，不做孬人！”就从那个时候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。

记得《西游记》中写花果山水帘洞时，有这么一副对联：“花果山福地，水帘洞洞天。”在我看来，书便是我的福地，打开书页，里面别有洞天。

洞天福地　刘加青摄